

(法)米歇尔·福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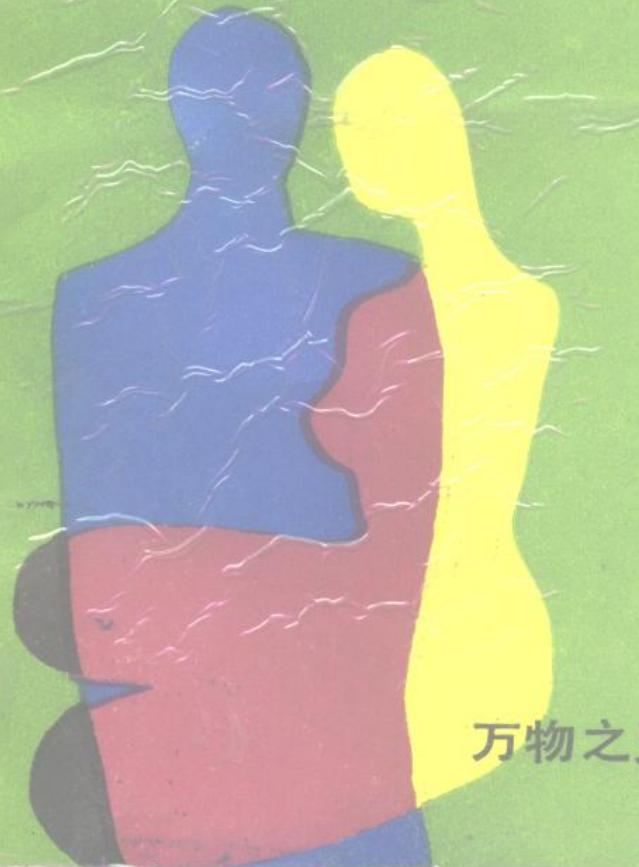
MICHEL FOUCAULT

上海文化出版社

性史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黄勇民
俞宝发 译



万物之灵丛书



73162

性史

(法) 米歇尔·福柯 著
黄勇民 俞宝发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小芬

封面设计：周志武

性 史

[法]米歇尔·福柯著
黄勇民 俞宝发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插页 2 字数 83,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600 册

ISBN 7-80511-227-4/K·15

定 价：1.55 元

DH.87/33

编辑前言

人——这个称为万物之灵的生命物种，在地球上生成以来，繁衍生息已经几十万年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为了求得生存与进步，不断地改造着自然，变革着社会，创造着文明。纵观人类文明史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人类文明的每一成果，无不是人这一生命物种的杰作。面对“人化了的自然”，人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只有人才真正称得起是“万物之灵”。

人在探索与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关注与研究自身的内部世界。认识自己，寻找自己，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古老命题，刻在古罗马阿波罗神庙里的一句箴言就是：“认识你自己！”可是，人要认识“自己”是多么不容易啊！黑暗的中世纪不去说了，当时的人只是神的奴仆。文艺复兴运动的巨大贡献，是升起了人文主义的旗帜，重新发现了人。但人的本性、本质到底是什么，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更替，总会有新的发现。现代社会的进步，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进

一步觉醒。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热点，理论研究的一个焦点。为顺应这一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万物之灵丛书》，着重从文化与社会的视角探索人、研究人，积累这方面的新成果，以有助于人了解人，认识人，提高人，完善人，并进而有助于人从“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逐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复归”。

《万物之灵丛书》包括国内学者的著作和翻译介绍国外学者的著作。国内著作的作者大多是中青年，他们思想活跃，勇于探索，论述都力求贴近现实，对人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探讨。当然这种探讨是“诸子百家”式的。译著则着重介绍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影响的国外研究专著，少量兼及在此以前的重要著作，以供借鉴。不论著作还是译作，文字一般在15万至20万字左右。我们注重的是书稿的学术质量，希冀的是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读者在阅读、了解和增进有关人的知识的同时，能够开拓视野、更新观念，提高境界，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8年1月

中译本序

50年代起源于法国，60年代盛行于西欧、北美的结构主义已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一种反人本主义的哲学流派。这种流派一出现，许多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便纷纷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方法，结合自己的学科、专长，在语言学、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等领域内创立了五花八门的新兴边缘科学。比如在世界各地，尤其在西方世界出现了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文化学，结构主义历史学等等，从而形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哲学运动。

法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文化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便是结构主义运动在历史学、文化史方面的一位杰出的、颇具影响的代表人物。在50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他曾先后担任过法兰西学院的思想史学教授、《评论》杂志主编、《风暴地带》评论月刊指导等职，并经常为法国各大报刊杂志撰写有关历史、文化方面的专题文章。福柯在长期潜心研究著述的基础上，发表了一大批具

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学术专著，其中有《疯狂与文明》（1961）、《言语与事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诊疗的诞生》（1973）、《监狱的诞生》（1975）等。他真可谓是一位在科研成就方面硕果累累的多产作家和学者，因而在法国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被公认为继萨特之后法国思想界的又一位杰出代表。

福柯与其他结构主义学者一样，对历史、文化等事物从结构上进行了分析研究，把结构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两大部分。他认为人类历史、社会的发展，不管其表面现象如何斑驳陆离，但都万变不离其宗，它们都受到内在的、固有的深层结构的约束、控制。这种制约力存在于我们生活、思想、行为的每个细节中。他在晚年完成的学术巨著《性史》正是试图运用结构主义的这一原理，去剖析人类性行为的发展历史；试图通过形形色色的性行为，寻找出某种他认为是隐藏着的、具有内在联系和固有的支配力量。在他看来，性行为多种多样，比如有夫妻间的正当性行为，有儿童的手淫，有通奸、强奸，也有同性恋、鸡奸、虐淫等反常的性行为，这些存在于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性行为尽管千差万别，但是人们仍可以找到它们之间固有的联系和共同之处。例如，他列举了英国文人和法国农民的有关事例。一位放荡的英国文人以自己荒淫的性生活为基础，写出了详细、具体地描写性活动的《我的秘密生活》一书；另一位法国农民愚昧无知，在田间玩弄了一个小姑娘后受到审判，被迫对他的无耻行为作出交代。这两个同时代的人虽然民族不同，阶级不同，环境不同，受到的教育也不同，但在福柯看来，他俩之间在性行为方面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性不论其是文雅还是粗俗，最终都得转化成

言语，性行为始终受到某种固有力量的束缚。他认为，这种力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诸如政府、君主、法律、机构等形式的力量，而是一种内在的、固有的力量，它们自成体系，构成一个连环，左右着我们的性欲。性行为决不是单纯的一种冲动，而是男人与女人、老年人与青年人、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牧师与俗人等诸种力量关系的转移点，是支持我们行动的有益成份。

《性史》一书共分四卷（原计划六卷，二卷未完成）。1976年初版的第一卷为全书的导言，法文版原书名为《认识的意愿》。它概述了作者撰写性史的意图、目的、方法、论述范围以及如何划分性史阶段等问题。福柯在书中引用了D·H·劳伦斯的一段话，从侧面说明了他撰写这部论著的意图所在：“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认识性。现在对于性的完全清醒的认识甚至比行动本身更为重要。”在他看来，对于性的认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因为只有通过对性的研究，才能解开“我们为何物”之谜。性是一切东西的解释，性是真理之所在。在数世纪之前，性就处于一个“了解要求”的中心。

作者试图探讨道德与性、正常性行为与反常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对性长期受到压抑这一说法提出异议。他告诉我们，在中世纪的欧洲，即使对于所谓的反常性行为也是相当宽容的。例如对于鸡奸的言语表述往往极其谨慎且言不尽意，尽管对犯有这种曾被看作是罪孽深重的行为的人施以火刑的现象一直持续到18世纪，但从很少有人遭受这种酷刑这一事实可以断定普遍存在着一种对它的容忍。

按照福柯的说法，清教主义和反基督教运动的发展才使性史出现中断，出现性压制的普遍现象。这种对于性的压制

被认为是自我克制、保存精力和崇尚自我修行的欧洲资产阶级的产物。封建贵族以高贵的血统来炫耀它的机体的特殊性和维持其统治；但是资产阶级在宣称具有一种特殊的机体时，它的着眼点是其自身以及子孙后代的健康机体。而性是这种健康机体的保证，资产阶级的“血统”是性，它把本阶级的未来希望寄托于性之上。为此，资产阶级力图以性技术武装自己。这种被称作性欲调用的技术应被看作是统治阶级的自我肯定，而不是对另一个阶级的奴役。因此，他认为对于性史的研究，应该努力摆脱权力的法律形式和否定形式，停止从戒律、禁止诸方面来构想它。

福柯从结构主义出发，宣称性与权力紧密关联，哪儿存在性，哪儿就存在着权力关系，权力是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认为权力仅仅在外部控制性欲，那么会导致“解放”的许诺。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因而我们所谓的性“解放”成败未定。福柯指出，被人们完全归功于弗洛伊德天才的性欲调用早已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准备阶段，他并没有为性恢复了长期以来被否认的一份合法权利，而仅仅以有关性的科学取代了爱的艺术而已。

在全书中，福柯采用交替扼要回顾性史的手法，把人类的性行为放在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环境中进行分析，力图找出这些力量对西方人的性观念的影响和作用，以及性欲、性行为对西方社会的反作用。书中不少精辟的论述不仅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同时也有具体的现实意义。比如，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富强与否不仅与其公民的数量和正直有关，而且也与其公民的婚姻习惯和家庭的组成有联系，与每个公民对其性的使用有关。国家是否了解它的公民在性行为

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对性的使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课题，必须有一整套理论、专门的知识和具体的措施与之相配套。

《性史》是一部十分严肃的学术专著。作者尽力把医学、历史、哲学、文化背景等知识融汇于一体，使之成为一门崭新的学科，成为一种历史，一种知识；从而使性脱去了它神秘的外衣，得到合理的解释。《性史》一书行文比较晦涩难解，但纵观全书，我们确实发现有不少惊人之笔，提出的不少问题也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发人深醒。然而，福柯作为一个结构主义学者，总难免受到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左右，他的观点因此也不可能象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一切从“科学”出发，而是常常颠倒了物质与意识的根本关系。所以，我们在阅读时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认真分析，评判书中提出的论题和观点，找出科学、合理的东西加以借鉴和吸收。

本书由罗伯特·赫尔利从法文译成英语，于1978年在美国和加拿大首次发表，后又多次重版，在英国等地也广为发行，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赞誉。中译本译自该文本，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误，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88年5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中译本序 1

第1部分 我们“其他维多利亚人” 1

第2部分 压抑的假设 11

 1. 谈性的诱因 11

 2. 性反常的移植 27

第3部分 科学的性欲 41

第4部分 性欲的调用 61

 1. 目标 65

 2. 方法 74

 3. 领域 84

 4. 阶段划分 93

第5部分 生杀之权 110

第1部分

我们“其他维多利亚人^①”

据说很久以来我们维持着一个维多利亚政体，甚至直到今天仍受其支配。于是，我们压抑、沉默、虚伪的性又笼罩上一种皇室故作守礼的形象。

17世纪初，人们似乎还能常见到一些坦率的行为。性行为无需多加保密；人们谈论它不用含糊其词，做起来也不用偷偷摸摸；私通之类的事司空见惯。与19世纪相比，对下流、猥亵和淫诲的管理法规相当宽松。在那个时代里，人们举止坦然率直，言谈毫无忸怩，越轨尝禁也是明目张胆。那时可以随意杂乱展示体解模型，成年人边看边谈笑风生，早熟懂事的孩子们也夹杂在其中：那是“竞相炫耀”人体的时代。

但事隔不久，薄暮便笼罩住这艳阳之天，随之而来的便是维多利亚资产阶级单调无味的黑夜。性被小心翼翼地约束起来，迁移至屋内。婚姻家庭将之禁锢起来，使它仅仅起到严肃的繁殖作用。只要一谈到性，沉默便成了常规。合法的、有生殖

能力的夫妇定下了这种法规。他们将之作为楷模，坚决实施这种规范，极力掩盖真相，在保守秘密的原则之下独享谈性的权利。只有一种性行为场所同时得到社会和每个家庭核心的承认，但它是一种实利和繁殖的场处：父母卧室。其余的性行为只能处于朦胧之中，举止文雅，以避免与异体接触，谈吐文明以纯洁语言。纯洁的行为包含着变态的痕迹；如果性行为执意过于暴露，它就会受到相应的指责，并为此付出代价。

就生殖或经生殖改变的事物而言，任何没有建立秩序的东西都不可能指望得到承认或保护，也别想得到发言的机会。它受排挤，被否定，只能默默无言。它不仅不存在，而且没有生存的权利，只要稍一露头，就会被迫消失——不管是行为还是言论都会遇到这种遭遇。比如，众所周知，孩子没有性欲，因此他们被禁止谈性；而每当孩子们表示出性欲时，人们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故意普遍地予以禁止。上述情况是压抑的特征，旨在将它区别于用刑法维持的禁令：压抑不仅起到主张消失的作用，而且也起到肯定性不存在的作用，还暗示和承认，这类事没什么可谈，没什么可看，没什么可知。这就是我们资产阶级社会的伪善与逻辑的残缺不全。然而，它也不得不出作出一些让步。根据推断，如果真有必要让非法性行为占据一席之地，那么就让它们到别处去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吧；到它们能得以重新结合的地方去，如果不回到繁殖的循环之中去，那至少也要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去。妓院和精神病院将成为容忍非法性行为的场所：妓女，病人，男妓，精神病医生以及其他歇斯底里的患者——正如斯蒂芬·马库斯(Steven Marcus)所说的那样，“其他维多利亚人”——似乎已经偷偷地把不可言语的肉体上的快乐转变成能够被计算的事物顺序。那里有

默认的言语和举止，可按现行率进行交易。只有在那些地方，性才能不受束缚地享受（被安全隔离开来的）现实的形式；而在其他地方，人们只能在暗中悄悄地，有节制地，符合道德规范地进行交往。在其他地方，现代清教主义强行实施着它的三条戒律：禁忌、非存在、缄默。

在那两个漫长的世纪中，性史首先必须被视为压抑不断加剧的编年史。那么，我们自己有没有从中摆脱出来呢？据说，摆脱的程度甚小。也许，弗洛伊德取得了某些进步；但是，如此小心翼翼，医学上如此谨小慎微，科学上确保无害，采取如此众多的预防措施，以求包罗万象，在那些最为安全、最为隔离的空间，在卧榻和言语之间，不必忧虑性的“泛滥”；然而，在枕席之上的却是另一番悄悄话。可是，这类事会不会出现其他情形呢？我们知道，如果从古典时代起压抑便是力量、知识和性三者之间的基本连结，那么我们就能据理推断：除非付出昂贵的代价，否则我们无法获得解放；非得违法乱纪，非得开禁废令，非得畅述欲言，非得恢复现实的快感，非得建立一整套新的力量机制不可。因为最微弱的真理之光也要受到政治的制约。因此，人们决不能期待从医学实践中获得预期的效果，也不能依赖理论的研讨，不管这种理论如何严密。于是，人们又转向谴责弗洛伊德的遵奉主义，心理分析正常化功能，赖希^②的激烈之中隐藏着的明显怯懦，以及由性“科学”所确保的整体化的所有效果和性学几乎是赤裸裸的实践。

这种关于现代性压抑的理论挺有道理，毫无疑问，这都得归功于立论的容易。一种严肃的历史和政治的庇护保全了它。通过把性压抑的时代推前至17世纪，有了数百年广阔的活动场所和充分的表达自由之后，人们恰好使性史与资本主

义的发展相吻合：它成为资产阶级秩序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性及其坎坷的次要编年史转变成生殖模式的礼仪演变史；它的细节方面正在逐渐消失。从这一事实可以引出这样一条解释的原则：如果性受到如此严厉的压抑，那么这是因为性与普遍和密集劳动的绝对需要格格不入。在劳动能力遭受系统剥削的时代，除为了使这种劳动能力能得以再生而最低限度地有点性行为之外，怎么可能允许分散这种精力去寻欢作乐呢？一方面，性和它的效果也许并不那么容易辨认；另一方面，如此复兴起来的性压抑又很容易被分析。而且，性的事业——追求性的自由，也追求获得性的知识和谈性的权利——合法地与政治事业的荣誉联系起来：性也被放到未来的议事日程之上。多疑的人们也许会想，为了使性史有这么一种令人难忘的起源，采取这么众多的防范措施，是否也会带有同样陈旧的假正经痕迹：仿佛在这种理论能够被表达或接受之前，稳定那些相互关系是必要的。

但是，也许使我们用压抑作为性和力之间的关系下定义，还有另一种使人满意的原因：某种也许被人们称为言者利益的东西。如果性受到压抑，也就是说遭到禁止，受到否定，以及被剥夺发言的权利，那么仅谈论性这一点就显然是故意违法乱纪。用这种言论发表意见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置身于力的作用之外，他推翻现存的法律；他仿佛在期待即将到来的自由。今天人们谈起性来如此严肃，原因就在于此。19世纪时，当首批人口统计学家和精神病医生迫不得已谈性时，他们认为在请他们的读者仔细阅读如此琐碎、如此粗俗的东西时，有必要请求他们的原谅宽恕。然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不换一种新的姿态来谈性是相当困难的：我们意识到我

们是在向现存的力量挑战，我们的声调表明，我们知道自己是在搞颠覆，我们拼命地念咒驱逐现状，盼望新时期的到来，我们相信我们正在作出的努力将加速这一天的到来。某种带有反叛气息，带有自由希望之光，带有崭新法律的时代即将来临的迹象，悄悄地潜入了这种性压抑的理论之中。预言的某些古老作用在其中重新活跃起来。明天性又将好转起来，因为性压抑已被证实，人们能够慎重地促使两种概念和平共处：革命和幸福；或者说，革命和一个绝然不同的肉体，一个更新、更美的肉体；或者说得确切些是革命和肉体上的享受；而我们多数人因怕被人讥笑或者怕历史的怨恨，而不敢将两者相提并论。我们之所以热衷于用“压抑”这一字眼来谈论性，是因为，毫无疑问，它为我们提供了谴责现存力量，表达真相，许诺福音，联结启蒙、解放、多种快感于一体的机会；宣告一种新理论的诞生，这种理论将把对知识的追求，对改变法律的决心，和对建立人间乐园的向往三者结合起来。也许它也解释了市场价值的根源：它不仅源于对性压抑所作出的议论，而且也基于这样纯粹的事实：那些试图消除压抑所带来的后果的人们获得了公众的注意。归根结蒂，我们的文化是唯一花钱雇用官员来听取五花八门的人们传播他们性秘密的文化：似乎谈性的迫切感和希望通过谈性唤起的兴趣，已远远超越了性被人听的各种可能性，从而要专门雇人来倾听。

但在我看来，最基本的事并不是这种经济因素，而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存在着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把代表揭示真相、推翻全球法规、宣告新纪元的到来、许诺某种幸福的性联系在一起。如今，性已被用来维持古老的讲道形式，在西方，这种传道方式是那么的熟悉和重要。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种大规

模的有关性的说教席卷我们各个社会，这种说教具有其思想敏锐的神学家和深得众人赞赏的论调；它抨击旧体制，鞭挞虚伪，赞美自发与真实；它促使人们憧憬一个新世界。这不禁使人们想到了弗巴西斯教派^③。我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在西方工业社会里，长期伴随变革运动的抒情性和虚伪的宗教信仰怎么可能被大量地带入性的领域。

然而，性压抑的概念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肯定性在虚伪、喧闹、负责的资产阶级时代遭受到的更为空前的迫害这一概念，正好与揭示性的真相、修整性在现实中的机制、推翻制约性的法律规范，改变性命运的夸夸其谈相联系。压抑的声明和压制与传道的形式相互依赖，彼此加强。说什么性不受到压抑，或性与力之间的关系并不以压抑为特征，那就有陷入无益的似是而非论的危险。它不仅与广为接受的论断相抵触，而且也违背整个机制，违背作为这一论断基础的各种“利益”。

这是我想在下文中展开一系列历史分析的出发点。本卷是全套书的导言，同时也想先谈谈我的总体打算和想法：本书将概述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并扼要综述某些理论问题。概括地说，我的目的是研究一个社会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大声谴责其虚伪性的问题，这个社会反复啰嗦地谈论它自己对性的沉默，费尽心机地详细叙述它没有吐露的事情，谴责它所行使的权力，许诺将它自己从使这个社会能得以运行的法律中解放出来。我将不仅探索这些说法，而且也将研究维持这种说法的意志，以及扶持这些说法的策略意图。我想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受压抑？”而是“为什么我们用如此巨大的激情、如此巨大的愤怒反对我们最近的过去，反对我们的现在，反对我们自己，说我们受压抑呢？”我们凭什么螺旋说来